

论孙中山讨伐陈炯明集团的军事战略

王显成

(湛江师范学院 历史系,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孙中山为讨伐陈炯明集团制定、实施了远交近攻,离间直系、陈氏关系等战略。它们的推行客观上有利于打击陈炯明集团。而其中的广筹资金,构建讨陈联军,确保战略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是从根本上打击、消灭陈氏集团的战略方针。

关键词:孙中山; 陈炯明; 讨伐; 战略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10)01-0017-04

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集团公开叛变。为此,历时近三年的讨陈战争拉开了序幕。而陈氏集团是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得到列强的支持,同时又勾结直系军阀的反动的叛乱集团。它一度控制广东绝大部分地区,并有逐步扩张之势。而广东长期又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根据地。因此,打败、消灭陈炯明集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深远的意义。孙中山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制定、实施了一些高明的战略,为平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然学术界无人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此,本人不揣冒昧,谈一点自己的研究成果。

应该说,孙、陈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他们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要不要建立全国性的民主政治等关键问题上。孙是护法军政府的最高军事、行政首长。陈为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他们两人,犹如一驾马车中并驾齐驱的两匹战马,走了一段漫长的路后,最终却因志趣不同,分道扬镳。陈氏的叛乱差点要了孙中山的命。整个广东为之变色,革命力量江河日下。为了讨伐陈的叛乱势力,他及时地提出了自己的军事战略,并通过它来指导反陈战争。

第一,阐述讨伐陈炯明集团的必要性

孙中山认识到必须从维护共和政体、实现和平统一的战略高度来指导讨陈战争。为此,他首先揭露陈氏叛乱的罪恶本质。陈氏叛乱的目的是“盘踞与割

据,以逞一己之私欲。”^{[1]521} 他的叛乱是一种报复行为,影响极其恶劣。“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因此,“绝其根本,勿使滋蔓”^{[1]522} 已成为时代赋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其次,揭示叛乱对和平统一大业的危害。1922年4月,在各界的强烈压力下,北京政府决定恢复《临时约法》与旧国会,全国有望统一。而陈氏的叛乱导致和平统一大业中途夭折。再次,陈炯明的叛变使革命党人遭受空前绝后的牺牲。也使世道人心叵测。孙中山为革命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而没有哪一次失败像陈炯明叛乱那样给他造成了如此大的打击。“此役则敌人已为我所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1]555} 陈氏的叛变使革命党人失去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权与基地。从此,革命派不得不沿着过去的老路苦苦挣扎:或流亡,或苦战。且战争的对手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罪孽深重的北洋军,而且还包括人数众多的叛军。

总之,在孙中山看来,陈炯明叛乱导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丢失与整个护法事业的中途夭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要确保护法军政府的安全,进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统一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首要的任务乃是打倒、消灭陈炯明集团。

收稿日期:2009-11-23

作者简介:王显成(1966-),男,湖南武冈人,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第二,推行远交近攻战略

孙中山的远交近攻战略就是联合、团结与直系有深刻矛盾的其他军阀势力,主要是远在东北的奉系张作霖、华北的皖系段祺瑞,来对付直系,从而更好地打击陈炯明集团。

直皖战争后,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导致了它与皖系、奉系及西南护法政府矛盾的加深。而陈炯明叛变,从某种程度可以说是直系与护法军政府矛盾的产物。因此,打击直系,具有牵制、削弱、打击陈炯明集团的意义。

早在叛变前,孙中山就认识到直、奉、皖之间“相争成相持之势。独吴佩孚跳梁其间,而为奉皖所同忌。”^{[1]421}此时,直系正在西南推行蚕食、鲸吞政策。共同的利益要求使孙中山推行联奉政策。“张预备与吴战,因求同志援助。”于是,孙张二人就信息共享等达成了一些共识。如1922年6月前后,孙中山三次得到奉张金钱的支持。并派汪精卫等为双方的联络员。为了减少护法省份的压力,1922年7月,孙甚至提议奉张进攻直系。尽管不为所用。但孙与张学良达成如下协议:“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后奉军“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孙称这一战略为以后“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1]558}。从以后孙中山与奉系的交往史来看,联奉战略确实较长时间牵制了直系的力量,对打击陈炯明集团有着明显的帮助作用。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把皖系作为联络的对象。考虑到直系李厚基部有可能与陈炯明势力合流的事实,他于1922年10月,写信给皖系王永泉,说:“福建今日之外患,不在北方之赣,而在于粤。”^{[1]605}因此,打倒、消灭陈炯明集团不仅是西南军政府的政治需求,更是皖系稳定脚跟、成就功业的基本条件。望他与许崇智等“和衷共济”,共创叛军。

论者在谈及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上,往往对他利用一派军阀来对付另一派军阀予以批判的态度。不过在叛乱已成不争的事实的时候,手无寸铁的孙中山用这种远交近攻的战略,至少可以缓和一下革命党人的困境。这对于打击陈炯明集团不无好处。因此,不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第三,离间直系与陈炯明集团的关系

直系与陈炯明集团之间,之所以建立短暂的军阀政治联盟,关键的原因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首先,直系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面临以孙中山为首的

护法军政府的反对。而陈又是该政府内的反对派。为此,才有吴佩孚的联陈行为。其次,在直系看来,西南地区最有实力而又愿为他卖命的,不是他人。而是拥有深厚历史底蕴、掌握兵权的陈炯明。再次,他们的联盟之所以建立,关键是直系对陈不太了解使然。因此,要打倒陈炯明,首要的任务是离间他们两者的关系。

张绍曾,1923年1至5月担任直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张早年参与策划滦州起义。他希望调停陈、孙关系,但并不了解张的实际态度,实质上反映了直系军阀希望挽救陈炯明政治生命的意愿。徐绍桢,广东番禺人。清末曾任统领。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历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23年,他因与张绍曾同为革命元勋,且私交甚密,被孙中山派为联络张绍曾及直系将领的最佳人选。

孙中山认为直系之所以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关键的原因是他们误认陈有实力,“故欲予优容。”而不知违背正义与人道必将失败,乃是一条铁的规律。对张绍曾调停的苦衷,他表示理解,“惟竟存奸伪,尚需慎审。夫以二十余年同党共患难之同志,一拂其割据之私,遂不惜反戈相向,置旦旦信誓于不顾,而谓其统一后愿将所部还诸中央,此何可信?”当时的直系与陈炯明是同床异梦。直系希望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以它为中心的独裁政权。而陈炯明则希望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小割据。因此,孙中山于1923年12月,通过徐劝张不要被陈玩弄。否则,人类赖以生存的伦理道德将完全丢失。“以此谋统一,去统一之真义愈远。”^{[1]65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朋友之间的信义是为人处事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往往是评判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一个政党是否合乎伦常的基本标准。而陈犯上作乱的行为令舆论哗然。而孙中山正是充分利用这一点揭示了陈人格的卑污与肮脏,使当时的政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与陈炯明集团关系的社会意义与价值所在。孙的上述举措客观上也导致了直系与陈炯明关系的恶化。吴佩孚认为陈太滑头,曾当着陈炯明的弟马玉航的面斥责他。并“电致曹錕及齐燮元,力言陈不可靠,以后断绝接济。”^[2]吴、陈关系的恶化,根本原因是军阀集团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但也与孙中山的离间政策不无关系。他们关系的恶化无疑对于彻底打败陈炯明集团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四,对陈炯明集团采取分化、瓦解政策

陈氏集团有着不少矛盾。孙中山善于利用矛盾,来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如对陈炯明派洪兆麟的湘籍士兵谋杀他的动机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为什么陈要动用湘籍士兵,而不是嫡系海陆丰士兵呢?孙中山认为是以下原因造成。

首先是为达到以敌制敌的目的。原因是洪兆麟久与陈家将不相容,他有一次曾以手枪与陈炯明相见,最后以陈向洪道歉而不了了之。陈知洪拥兵自重,非设法驱除,终必为害。罗绍雄虽与人无争,“而湘籍军,实为陈氏所最恶”。陈希望借事变铲除他们。其次,在事变不成时,尚可委为不知,以图转圜。“其用心之险诈,考虑之周详,殆为天下之模范矣。”^[3]¹⁸³以上分析,使国人对陈炯明的阴谋狡诈、自私自利的品德有了更深的认识。而这加剧了叛军集团的分裂。

由于陈为人奸诈,且违背潮流。而孙为人宽厚,待人以诚。正是这种人格的魅力常常感召不少敌人营垒中的人。而这也毫无疑问地导致了陈炯明集团的分裂与瓦解。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海军将领温树德在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温树德曾是陈炯明手下的海军舰队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后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平叛工作。后又变节。而到1923年2月,温氏又希望转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对于这个有功于革命,中途又背弃的海军干将,孙中山的态度又是怎样呢?他没有记隔夜仇,相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他放下包袱,大胆地投入到革命阵营中来。“文常以为天下事当与天下豪杰共之,苟忠于文之主义,虽仇可友……兄为文炮击观音山之义举,文至今固未尝一日忘也。”^[4]¹¹³正是因这种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一心为公的品德使他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士心。而这为更多地争取朋友、减少敌人,集中最主要的力量打击陈炯明的死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五,建立联军,确保军事战略的科学性、权威性

首先是广筹军费。孙中山设筹饷局以筹军费。该局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变卖市产。由于军费极为紧张,它被迫依靠变卖市产来筹军费。本厅“不得已变卖市产,以济饷需。”但因外间谣言,不少人裹足不前。为此,军政府劝民众“勿因谣言而惊疑”,大胆地购买市产,“以辅政府之进行,以图最后之胜利。”^[5]孙中山用变卖市产的方法来筹军费,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明智之举。如1925年的广东岁入费为12,711,737元,军费开支达15,588,212元,其中不

敷287万元^[6]⁸³。入不敷出的窘境迫使他变卖市产作为解决军费问题的重要手段。其次是减少行政开支。如大本营“月薪在21元至100元者给半数……300元以上者给二成。”^[7]由于经费紧张,以至“各人枵腹从公,困难万状。”这种现象直到1924年底才有所好转。再次,鼓励海外华侨等捐助。如暹罗等地的华侨都积极捐款,支持他的讨陈战争。

以上措施为讨陈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建立讨陈联军。当时孙中山没有自己的正规军。但有不少同情、支持他的有一定军阀色彩的武装。如许崇智的粤军等。这些武装因受革命思潮的感召,被编练为以讨陈为目的的联军。

再次,确保军事战略的权威性与科学性。

一是确保军事战略方针的科学性。战略方针是确保战略目标实现的策略与手段。科学的军事战略方针是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相符,可以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的军事策略。科学的战略方针的应有之义是根据实情,采用不同的军事策略。如1922年6月至8月,敌强我弱,支持他的北伐军远在前线。远水解不了近渴。为此,他推行的是依托海军,坚决抵抗、打击叛军、等待援军的以静制动的战略。从1922年8月到1924年1月,为了夺取东江地区,确保广州安全,采取联合滇军等武装打击、消灭陈炯明集团的战略。而到1924年至1925年,他更多地依靠新式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来对付叛军。正是因坚持了军事战略的科学性,才取得了讨陈战争的胜利。

二是确保军事战略方针的权威性。军事战略方针的权威性就是一个军事战略方针被确定了以后,必须付诸实施,并保证其应有的效力。如1922年10月,陈炯明将重兵布置在东江流域,并有“和西战东之诡谋。”为了打破敌人的战略意图,孙中山提出了全力打败东江之敌的战略。“要之,彼不能有东西兼顾之力量,即为我军恢复百粤最良机会。”^[4]⁵⁹¹为此,特派邹鲁回香港,与各方联络、策应。1923年1月,发生了沈鸿英绑架魏邦平事件。对于该事件的处理,实在是耐人回味。孙中山曾多次声言要讨伐沈鸿英这个新的军阀。而后又极力争取他的回心转意,望他“益加奋发……俾建国之乐,臻于完成。”^[4]¹³⁸为什么孙中山对沈鸿英集团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认为关键的原因只能从当时广东内部政局与孙中山战略的科学性、权威性需要予以说明。首先,孙中山毕竟是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革命家。而他

又要护法,完成国民革命,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幻想、依靠、利用各种各样的军阀势力。其次,讨伐陈炯明集团依然是维护、巩固、发展广东革命策源地的压倒一切的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不得不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再次,对沈鸿英集团政治态度的变化是服从、服务于打破陈炯明集团的“和战东之诡谋”的需要。因它至少可以暂时缓和一下与桂军的矛盾,以赢得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对付东江地区的叛军。

军事战略的权威性、科学性是相辅相成的。科学性是基础,权威性是科学性的必然的要求。它们是确保军事行动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它们之所以产生,也是与时代相宜的。一方面,孙中山毕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爱国爱民、天下为公的品性迫使他时刻想到:要维护共和政体,必须采取适当的方略与对策去打击自己的敌人。而陈炯明集团是从革命阵营中分离出去的拥有很深的社会基础、得到恶势力支持的反动军阀势力。要打击、消灭它,必须

保证军事战略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时代的新变化与孙中山的政治品性的质的飞跃又使其军事战略有了新的发展。旧有的依靠军阀来打击军阀的策略已经过时,孙中山要想赢得讨陈战争的胜利,必须在思想与观念上发生新的变革:不得不依靠新兴的受到三民主义熏陶的党军以及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支持。可以说,正是坚持了军事战略的权威性、科学性才使他最终赢得了讨陈战争的胜利。

总之,面对陈炯明集团的叛乱,孙中山采取了科学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的战略使他可以更好地拖住陈氏的盟友,一心一意地去打击陈炯明集团;离间直、陈关系的战略导致了它们关系的长期恶化。分化、瓦解政策导致了陈炯明集团内部的分离。三者都是用外交力量打击陈炯明势力。而建立联军、确保军事战略的科学性、权威性是解决陈炯明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是运用国民党的力量、运用统一战线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陈逆失信于吴佩孚[N]. 广州民国日报,1924-01-04(6).
- [3]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 陈炯明叛国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7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市厅劝输军饷之布告[N]. 广州民国日报,1923-10-02(5).
- [6]彭明.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2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 [7]帅府欠薪照旧支給[N]. 广州民国日报,1924-02-22(8).

On Sun Yat-sen's Military Strategies Against Chen Jiongming Group

WANG Xian-cheng

(History Department,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Sun Yat-sen'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in crusading against Chen Jiongming Group, such as befriending the distant enemy while attacking a nearby enemy, alienating Zhi Warlords and Chen Jiongming Group, etc. the use of them is beneficial to defeat Chen Jiongming Group objectively. Among them, raising fund and organizing an army against Chen Jiongming Group, ensuring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d authority for the strateg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policy which defeat and eliminate Chen Jiongming Group.

Key Words: Sun Yat-sen; Chen Jiongming Group; crusade; strategy

(责任编辑:彭 原)